

臺灣運動與宗教之研究—學校運動會的神聖性研究

本文旨在探討學校運動會可能蘊含之神聖性。全文首先摘述神聖的相關重要理論，其次說明學校運動會之神聖意涵。

壹、「神聖」之理論性探討

「神聖」(the sacred)一詞，根據 Hoffman(1992: 6)的分析，至今有兩種可能的指涉，一為指涉超自然或神聖秩序；一為指涉人所接受之，大於個人的力量和象徵。因此，本文試圖根據這樣的劃分，分別說明源於超自然及非超自然之神聖。

一、超自然的神聖

神學理論上，關於超自然神聖的探討最著名者有二，一為 R. Otto 在《論神聖》(*The idea of the holy*)一書中對神聖概念的分析；一為 M. Eliade 在《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一書中對神聖空間及神聖時間的分析。茲將二者要點說明如下：

(一)Otto

Otto 在探討神聖概念時，指出過去在使用「神聖」一詞時，通常意指道德上的『完善』(completely good)，然這樣的意義卻是衍伸出來的、並非神聖最初的意義(Otto, 1917/1923: 5-6；成窮、周邦憲譯，1995：6-7)。他認為神聖之本質乃是非理性的成分，他以一個由拉丁詞 numen 杜撰而成的詞（即 numinous，神秘的）來代表之，並且試圖探討某種獨特的『神秘的』價值範疇與某種確定的『神秘的』心態(Otto, 1917/1923: 6；成窮、周邦憲譯，1995：7)。前者主要處理某種超自然、神秘之對象的特性，後者則指人們對此對象的神秘感受。

Otto 首先指出：「『神秘』經驗的特殊內容之一，是具有威嚇性質的『敬畏』和『威嚴』，這種經驗同時還有另外的方面，在這個方面中，該經驗表現為某種具有獨特吸引力與神往性質的東西。於是這兩種性質，即畏懼與神往，便以一種奇特的對立統一方式結合起來了。」(Otto, 1917/1923: 31；成窮、周邦憲譯，1995：36)換言之，人對於某種超自然或神秘對象的體驗，必然帶有畏懼與神往這兩種相對立的感受，誠如 Otto 自身所言：「一方面，受造物在它面前戰戰兢兢、膽怯萬分、五體投地，但同時又總要情不自禁地轉向

它，甚至還要使之變成他自身的東西。」(Otto, 1917/1923: 31；成窮、周邦憲譯，1995：36-37)

伴隨著人對於神秘者的感受，Otto 提出神秘者的三種性質，分別是絕對不可接近性、不可抗拒性及活力。Otto 在書中以「完全相異者」(the “wholly Other”)一詞來指稱這種超自然、神秘的對象。他指出：「這個『相異者』完全超出了通常的、可理解的與熟悉的範圍，因而完全落到『辨察』(canny)的領地之外並與之相對峙，使心靈充滿了茫然的驚奇與驚愕。」(Otto, 1917/1923: 26；成窮、周邦憲譯，1995：31)人面對這個完全相異者會產生驚懼(stupor)的感受，它指的是一種茫然的驚奇，即一種使我們啞口無言的絕對驚愕(Otto, 1917/1923: 26；成窮、周邦憲譯，1995：30)。

完全相異者還是有著終極價值者，因此，面對於這個有著終極價值的對象，人們會感受到一種「受造感」，這是一個受造物所具有的感受，與那個高踞萬物之上的權能相比，這個受造物自感卑微渺小、等同虛無(Otto, 1917/1923: 10；成窮、周邦憲譯，1995：12)。此外，在讚美這個終極價值的同時，人們會貶抑自己，視自己為無價值，因而產生一種褻瀆感(Otto, 1917/1923: 53；成窮、周邦憲譯，1995：

60)。由此，遂有使自己『聖化』過程的產生，此一過程能使接近者自己變得『神聖』，使他從他的『凡俗』存在中解放出來，並使他宜於同『神聖』進行交往(Otto, 1917/1923: 56；成窮、周邦憲譯，1995：63-64)。人們還會深切感受到「救贖」的必要和渴望，因為身為無價值之「受造物」的人類，若想要接近神聖、與神聖交流、持續佔有神聖，甚至還作為至善來加以欲求，救贖是必要的過程(Otto, 1917/1923: 57；成窮、周邦憲譯，1995：64)。

(二)Eliade

Eliade 對於神聖空間和神聖時間的探討，對運動會可能蘊含的神聖意涵來說，是特別具有參考價值的。畢竟，運動會作為一種學校行事曆中固定的活動，可視為一種節慶，亦即是一種神聖空間和時間的建構。

1. 神聖空間的建構

Eliade 指出：「這（神聖空間）是作用於空間中的『突破點』，顯示出所有未來定向的『定點』與『中心軸』。當神聖在各種聖顯中顯示自身時，不僅在空間的同質性中有一個『突破點』，而且還有一種對絕對實體——相對於可無限延伸的非實體——的揭露。」(Eliade, 1957/1959: 21；楊素娥譯，

2000：72)根據上述陳述，吾人可將神聖空間的特性歸納為三：(1)非同質性，即突破於空間中，與一般的空間產生斷裂；(2)指出定向，即以這一突破點為中心軸、為定點，為一切定向；(3)揭示絕對實體，即在神聖空間中揭示了絕對實體。

建構神聖空間有其要件，Eliade 指出：「人類建構神聖空間的儀式，在仿效諸神工作的範圍內，才是有效的。」(Eliade, 1957/1959: 29；楊素娥譯，2000：79)亦即要模仿諸神從混沌中之創生宇宙，他說：「成為『我們的世界』，首先需要『受造』，而且，所有的受造物都有其典範的模式——亦即諸神對這宇宙的創造。」(Eliade, 1957/1959: 31；楊素娥譯，2000：81)而經過諸神創生的宇宙，才是被聖化、有定向、有秩序的空間。

建構這樣一個神聖空間對於人類而言，有深厚的存在意義。Eliade 曾說：「神聖空間的揭露和顯現，對宗教人而言，具有存在性的價值，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先存的定向，便不會有任何事物可以開啟及進行，而這個顯現與一切的定向，便包含著一個『定點』的取得。」(Eliade, 1957/1959: 22；楊素娥譯，2000：72)對宗教人而言，這樣一個神聖的空間

可以使其獲得定點，進而得在同質的混沌中獲得『定向』、建構這個世界，並以真實的意識來生活(Eliade, 1957/1959: 23；楊素娥譯，2000：74)。換言之，在神聖空間中，他的存在是有意義的，他才擁有真正的實存(Eliade, 1957/1959: 64；楊素娥譯，2000：113)。

2. 神聖時間的建構

神聖時間的性質亦和神聖空間一樣，是非同質的，其是不同於凡俗時間之時段，亦即是節慶的時間(Eliade, 1957/1959: 68；楊素娥譯，2000：115)。此外，神聖時間還具有可逆轉性及無限重複性，正如 Eliade 所言：

神聖時間本質上，是可逆轉的(reversible)。在我們可以理解的範圍內，更適當地說，它是原初的秘思性時間，臨現於此時。每一個宗教節慶、所有禮儀中的時間，都是將發生於過去的神聖事件，也就是發生於『在起初』(in the beginning)的秘思性過去，再次實現於此時。

因此，神聖時間可以無限地重複、無限地循環。(Eliade, 1957/1959: 68-69；楊素娥譯，2000：116)

此處所言之神聖事件，就如同神聖空間的建構一樣，乃是重複諸神創生宇宙之時，而節慶的運作，就在紀念諸神在時間之初時的孕育造化 (Eliade, 1957/1959: 70; 楊素娥譯, 2000: 116)。隨著每一次地紀念、每一次的節慶，神聖時間即被重複。此外，神聖時間的可逆轉性正表現在神聖時間乃是宇宙創生之時，乃是「在起初」，因此，每經歷一次神聖時間，時間就重新開始啟動。

凡俗時間與神聖時間之間的過渡，必須首先有賴廢除凡俗時間、回到混沌之時的儀式以及紀念宇宙創生之儀式。就前者而言，是藉由一種標示著「世界終了」的儀式所完成。火的撲滅、亡靈的回復、祭神節日的狂歡、情色、狂飲的放縱等社會性混亂等等，象徵著由宇宙退化回混沌。(Eliade, 1957/1959: 78-79; 楊素娥譯, 2000: 125); 就後者而言，則是再實現宇宙創生時所發生之事，包括禮儀行動以及固定的誦讀(神話故事)兩方面(Eliade, 1957/1959: 77; 楊素娥譯, 2000: 124)。此處，神話的誦讀尤顯重要，Korsgaard (1990:117)即指出「神話可以被視為對於儀式行動的引導。」如無神話作為儀式行動的脈絡，儀式行動即不具特定的意義。

定期回到神聖時間，對於宗教人而言，也具有實存的意義，因為「眾神與祖先們曾做過的每件事，都藉此神話故事而必須述說有關他們創造活動，這是屬於神聖的領域，也因而參與了存在（being）。」（Eliade, 1957/1959: 96；楊素娥譯，2000：141）。對宗教人而言，神話故事中的作為，乃是一種典範模式，可引導其態度和行為，如同在神聖空間中的定向，其可以獲得真正的實存。其次，由於時間的逆轉，不僅世界重生、宗教人也得以重生，他說：「世界週期性地退回混沌狀態的意義，便是使這一年的所有『罪惡』，所有被時間污染及耗損下的每一件事物，都會在這句話的具體意義下被消除了。藉著象徵性地參與世界的毀滅與再造，人也重新受造；人重生，並重獲一個新的生命。每逢新年，人會感到更自由、更潔淨，因為人從罪惡與沈淪的重擔中被拯救出來。」（Eliade, 1957/1959: 79；楊素娥譯，2000：126）此外，回到神聖時間，生命的神聖幅度也可被恢復，參與節慶的人會經驗到人類存在的神聖尊嚴，一己乃是神聖的受造者（Eliade, 1957/1959: 90；楊素娥譯，2000：135）。站在Eliade的基礎上，Caillouis(1939/1959: 107，126)則看到節慶對於社會的影響，他也將節慶界定為是創造時期的重

演，而指出節慶所擔負功能乃是淨化及更新社會、重建自然與社會的秩序；此外，節慶中的混沌階段，也提供了社會各階層、各對立團體一個相互融合的機會。

總體而言，Eliade 之神聖空間與神聖時間，乃是一個有秩序宇宙的再創。此一觀點，吾人也可在 P. Berger 《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一書中找到，學者 Wuthnow(1992: 18) 指出，Berger 將宗教界定為「透過人類的活動所建立的一種包含一切的神聖秩序，亦即一個神聖的宇宙」。在此中，人們得以找到一切事物（包括人類自己）的意義，以及人類自身在宇宙中的定位。

二、非超自然的神聖

除了從超自然的對象（亦即一般所謂的「神」）來探討神聖外，E. Durkheim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神聖亦是相當著名的。對 Durkheim 而言，一切有著神聖性質的實體基本上都是社群本身的象徵，因此，可界定社會是人類尊崇的實際或終極對象(Hoffman, 1992: 4)。換言之，在 Durkheim 的理論體系中，「社會」這個超個人的實體，取代了超自然的對象，其指出：「神性是集體的象徵表達」(divinity is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of the collectivity)(Durkheim,

1925/1973: 105; 陳光金譯, 2006: 79)。所以, 具神聖性的, 乃是社會的集體意識、道德價值, 其作為一套神聖的信念, 當其在神聖的儀式中被規律地頌揚時, 可用以增加社會的一致性並確保社群的生存。

Durkheim 不採神學的觀點, 而採社會學的觀點來探討神聖, 乃因他想瞭解的是宗教中的儀式、象徵、神話等在社會運作中所具有的功能, 並從此角度來界定神聖。就此角度而言, 學校亦屬於社會的一種, 而學校中的儀式所能發揮的功能, 尤為概念分析的教育哲學家 R. S. Peters 所強調。他在《倫理學與教育》(*Ethics and Education*)指出儀式有以下功能:

1. 使學生知道終極價值, 其云:「一所學校的『社會氣氛』最有可能受到儀式的影響; 因為儀式是不需清楚闡述即可讓他人知道終極價值的最有效方式之一。」(Peters, 1970/1966: 318)這對於兒童的道德教育而言, 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兒童在尚未理解道德的原則原則和行為形式前, 就被引導致其中, 而儀式乃是「一種可標示出一種實踐之重要性並讓兒童感到這是一種應該參與之實踐的方法。」(Peters, 1970/1966: 318)

2. 吸引局外人、維持局內人信念，其云：「儀式就既能吸引那些仍未進入實踐的人，又能有助於那些已進入實踐的人們喚醒並維持內在於實踐中的信念。」(Peters, 1970/1966: 318)

3. 促進現在、過去與未來的連結，以及社會的凝聚，其云：「這樣的儀式有助於結合過去與未來，而且能傳達參與一種共享之生活形式的感覺。它們能緩和任何理性者必有之人生在世平庸及短暫的感覺。它們也能大大地有助於發展同胞愛的感覺，這是任何有效率制度的原動力。」(Peters, 1970/1966: 319)

此外，他和 Bernstein 所著的《教育中的儀式》(Ritual in education)一文中，也提到學校中各種集會、慶典、標誌、圖騰等一致化的儀式，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其云：

這些儀式的運作是為了將學校裡的所有成員結合在一起，師生能成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一個獨特的集體。這些一致化的儀式讓學校在時空上連續，它們回復了過去的精神並且投射於未來。這些儀式也將學校價值與規範和校外社會某些優勢團體所主張的價值與規範連結。一致化的儀式讓學校認同自己為一個獨特的且分立

的制度。他們促進對於廣大社會主要價值體系的恰當情緒。它們協助整合各種學校目標於一整套連貫的共享價值中，使學校的價值能內在化且能經驗到整體的學校價值。(Bernstein & Peters, 1966: 429-430)

總體而言，學校儀式的功能一來可以在時空上建立起連續性，延續學校的價值及傳統，以凝聚學校師生，使其成為一個共同體；二來，亦是最重要的部分，乃是使學校的價值和社會上的價值和規範作連結，並透過儀式來增強社會秩序，此乃是兒童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徑。運動會作為一種節慶，亦有著固定的儀式，其是否亦能發揮這些社會功能，在師生的心目中建構社會（包括整體社會以及學校這個小社會）之集體意識及價值的神聖性，乃是未來運動會在舉辦時可以思考的方向。

貳、學校運動會之神聖性

一、古希臘運動賽會的精神

三千多年前，古希臘民族各城邦定期在奧林匹亞舉行體育競技，這是一種結合祭祀神祇與運動的賽會活動。當時的希臘人認為，神也具備人的性格，喜愛遊戲，所以在祭典盛會時，以遊戲項目，例如舞蹈、競技等身體活動，來表達對

神明的虔敬，因此古代希臘的體育活動含有隆重的宗教意識(宋清榮，1979：56-58)。除此之外，許立宏歸納古代奧運的精神還可以包括幾個要素：停火(和平及暫時終止爭論、攻訐和誤解)、榮譽及誠實(身為運動員)、美(身體)、藝術(雕塑、音樂及詩歌等)、公平競爭(服從裁判及規則)、追求卓越以及成功地整合道德、藝術、智慧和身體創造力的和諧概念等(許立宏，2005：218-219)。把宗教的神聖性融入在運動賽會中，不僅建立了古希臘奧運的崇高意境，團結了希臘各民族的向心力，更創造出輝煌的希臘文化。一直到今天，古希臘運動會的精神仍然延續著，現代國際奧運會還保留著當時點燃聖火的神聖儀式，只是宗教色彩逐漸褪去，取而代之從文化創造與藝術審美的角度，來形塑莊嚴隆重的神聖性。

二、台灣學校運動會的起源與發展

(一)台灣學校運動會的起源—以公學校為例

根據現有文獻資料，台灣學校運動會首次出現在 1897 年的日本統治時代，1900 年之後以北部諸學校為中心逐漸普及，最遲在 1910 年之前大概台灣各地學校都有舉行運動會的紀錄，但還沒有變成每年固定的學校活動，1920 年代後期，運動會開始頻繁舉行，有時是大型的區域型聯合運動

會，有時由附近幾所學校聯合舉行中型的運動會，有時只是本校校內的體育運動會。舉行的日子有不少是選在星期六或國定假日，一方面方便地方長官、來賓與家長參加，另一方面可以將運動會與平日的「上課」區分開來，讓兒童感受運動會的節日氣氛。此外，運動會的舉行有時是在教育敕語奉讀式後舉辦，或是先舉行天長節的祝賀儀式後才開始，或是在參拜台灣神社後舉辦運動會，這都是教育者特意安排，把國家祭典所象徵的天皇制信仰，不知不覺的灌輸給學生(許佩賢,2005：296-305)。

(二) 日據時代台灣公學校運動會的特色

日據時代的學校運動會具有多重功能，它不僅是運動性質的集會，以達到強健體魄的目的，有時也安排參觀樟腦局、製藥所等，結合新知識的吸收。此外，有些運動會除了唱「君之代」之外，也宣讀「教育敕語」、然後高呼「天皇陛下萬歲」作為結束，而且活動過程中的整隊、隊五行進等，基本上是屬於兵式體操的操練，這些都表現出運動會的軍事意義，也顯示運動會是宣示國家意識型態的場域(許佩賢,2005：305-315)。

日據時代公學校的運動會除了具有殖民者馴化人民，灌

輸國家意識型態的作用，對地方社會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量。透過參與運動會的機會，可以改變家長對學校的認知和觀念，而且基於運動會需要地方民眾在財力和物質上提供協助的緣故，也使得運動會成為公眾介入的公共空間。當運動會的午餐、獎品以及經費是由地方民眾捐贈時，民眾對於學校更能視為大家共有，此時運動會就具有社會動員與凝聚地方認同的功能。此外，地方菁英贊助運動會，並且成為會上嘉賓，有助於維持其在地方社會的特別地位，因此運動會也扮演地方菁英維持與獲得名望的舞台(謝仕淵,2003：18-30)。

(三)當前的台灣學校運動會

當前台灣各級學校運動會的舉辦，是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四款」辦理，以落實體育教學與活動、發掘運動人才、倡導正當休閒、提昇學校運動風氣與養成終身運動習慣為宗旨。舉辦時間除可配合各級學校校慶活動舉辦外，也應注意各運動競賽種類之季節性。至於舉辦活動的種類包括以下幾點：第一、體育正課教學項目或學校重點發展特色運動種類及項目；第二、競技與非競技性運動種類或趣味競賽；第三、民俗技藝、國術、舞蹈、

啦啦隊、大會舞或大會操等表演活動；第四、學校得配合運動會設計相關表演或成果展覽；第五、其他經籌備會議決之相關活動(洪嘉文,2002：5)。

教育部明文規定學校每年應舉辦運動會，所以各級學校每年或單獨或聯合舉辦運動會，也經成為傳統性和例行性的學校行事。雖然學校對於運動會的舉辦已累積豐富經驗，但是學者指出，由於主辦者昧於學校運動會的旨意，或者因客觀因素影響舉辦學校運動會之目的，而衍生諸如「過分強調競技運動的小學運動會」、「重門面及鋪張的運動會」、「辦理例行公事而毫無創意的運動會」等流弊產生(葉憲清,1990：35)。

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台灣早期公學校的學校運動會，帶有濃厚殖民馴化的意味，它是經過特意的設計與安排，來達到殖民統治的目的，雖然其中也有部分知識與新觀念推廣、凝聚地方對學校的認同感與向心力等作用，基本上還是不離「同化」台灣人民的大方針。如果就當時學校運動會與日本國家祭典相互結合的設計來看，祭典是宗教儀式，具有莊嚴神聖的氛圍，透過宗教性的情境安排，不僅神化日本天皇，更能形塑虔敬與景仰之心，強化學生對統治國的歸順與

崇拜。這種情況類似古希臘民族結合祭祀神祈與運動賽會的活動，只是古希臘人藉此表達對神明的虔敬，這是宗教意識的顯化，但是日本的動機與目的截然不同。就此而言，台灣初期的學校運動會，雖然結合宗教祭典來建構神聖氛圍，但是運動會的神聖性只是統治者遂行殖民目的的工具，並非真正運動會崇高而神聖的意涵。

現今台灣各級學校運動會的舉辦，已經擺脫日治時代濃厚的殖民目的，活動內容也呈現多元豐富的樣貌。不過教育部所揭示的運動會宗旨，偏向運動休閒、運動習慣與運動人才拔擢，有關運動會的心靈教化著墨有限。此外，由於運動會已經成為學校常態性活動，行之久遠容易流於形式化，讓其中的深度意涵隱而未顯。揭示運動會的神聖性，可以讓運動會兼具身心靈同時並修，以及凝聚學校認同意識與向心力的教育意義，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三、學校運動會的神聖意涵與神聖性的建構

(一) 學校運動會的神聖意涵

綜合前述理論探討可以發現，從宗教學的立場來看，「神聖」的神秘經驗具有「敬畏」和「威嚴」的性質，同時也具有獨特吸引力與令人神往的特性。運動會顧名思義是以運動

為主軸的賽會活動，運動經驗本身是否具有類似「神聖」的神秘經驗之特性？近年來西方的體育研究，已經有人開始探討運動的心靈變化，強調運動對生命存有超越的重要性(劉一民,2005：295)，此外從運動員本身的真實體驗也顯示，運動是心靈的修行，當運動變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害時，運動場就是「聖地」(Jackson & Delehanty, 1995)，此時原初運動的物理空間，已經轉變為「神聖空間」，讓運動事主同時產生「敬畏」與「神往」之情。所以運動對於當事人而言，不只是生理性的身體活動與心理情緒的舒發調節，而是一種超越「小我」，進入無執著、無分別的「無己」之境。

Eliade 認為，現代人以直線的、否認超越人之外的原初時間向度，自己宣稱成為歷史的主宰，承擔歷史所有的責任與意義，卻又無法忍受面對虛無、耗損的歷史。他提出的解決之道是，重返原始人的宗教世界，重新尋回神聖對人的意義，喚醒現代人日益枯竭的靈性(王鏡玲,2000：28)。對於運動事主而言，運動的高峰經驗所具有的「神秘性」，無疑是通往「超凡入聖」的路徑，也是靈性的喚回與再生。此時的身體已經轉化為神聖的「小宇宙」，是追求自身生命圓滿的道場，通過身體，最終超越身體的束縛，而臻於生命的釋

放與自由之境。

運動經驗的高峰狀態具有宗教的「神秘性」，透過「神聖性」的建構與顯化，學校運動會不只是身體活動的運動賽會，還能成為神聖的時間與空間，提供自我生命的觀照與構築人際緊密關係的契機。

(二) 學校運動會的神聖性建構

Eliade 認為，從凡俗時間進入神聖時間，首先要廢除凡俗時間，回到渾沌時的儀式，以及紀念創生之儀式，可見儀式是建構與顯化神聖性不可或缺的要件。Durkheim 則把神聖性視為建構社會集體意識與道德價值的媒介，一套價值信念只要在神聖的儀式中被規律性地頌揚，就可以強化社會的一致性與確保社群的穩定生存。儘管 Eliade 的宗教學立場與 Durkheim 的社會學觀點，對於神聖性的起源與功能有著不同的見解，但是兩者都肯認儀式是建構神聖性的必要條件。因此，學校運動會的神聖性建構，也有賴儀式的設計與安排。

(一) 儀式運用

「儀式」是建立在集體的行動主體上，行動的程序和結構，儲存了集體的知識、記憶和情感。經由共同認可的儀式表演，可以將生活的世俗空間，轉換成精神的神聖空

間，進入文化的深層意義中。所以「儀式」是在現實空間之上，建立起虛擬的空間，利用現有的陳設物，在儀式的操作下，呈現出主體活動的形上理念，儀式參與者由此進入神聖的空間，此時空間雖然還是實有，在意識上已經是精神性的空間(鄭志明，2001：70)。就此而言，物質性的空間裝置，可以通過「儀式」而「由俗入聖」，開顯神聖的意涵，所以學校運動會的開幕、運動員宣示、會旗進場、表演與頒獎等儀式，其實是轉化俗境為聖境，體現文化意識的契機。儀式的真正意義在表達一種願望或企圖，儀式越是莊嚴隆重，越能感染參與者的情緒，將小我融入在集體性的氛圍中(林秀珍,2007：47)。例如，日治時代公學校的運動大會是由全體合唱軍歌揭開序幕，以高呼擁戴天皇的口號作為結束，讓學生不知不覺地接受安排其中的規範，這是運用儀式以達到建立集體意識與價值認同的目的。現在的學校運動會如果能夠藉助儀式功能，自然融入正面的價值規範，可以使學校的教化功能達至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 環境設計

環境設計是無形的境教。舉辦運動會的時候，運動場變成「非日常」的空間，學校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透過不同

的裝飾與改變，可以達到多重目的。例如，日治時代面臨戰事時期的運動會，特別強調集團觀念，「氣魄涵養」與「統制規律」是重點，所以當時運動會的會場佈置掛滿寫著「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與「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旗幟標語。又如明治 34(1901)年第一、第二附屬學校聯合運動會的場地佈置，讓參與者感覺運動會是與日常的時間、空間隔離開來，穿過會場中的拱門，好像進入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或許會讓平時表現不佳的學生，有揚眉吐氣的機會(許佩賢,2005:323)。所以通過有形可見的會場佈置與標語文宣，也是建構神聖性可以用心著力之處。惟民主自由是當前主要的教育思潮，學校運動會的「神聖性」建構不應淪為政治操控與灌輸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而應朝向學生身心靈共修，以及通過共同的身體經驗以建立人際互動的密切性等方面來開展。

四、小結

本文首先從超自然與非超自然的向度，來探討神聖性的意涵。從超自然的層面立論，神聖性具有「敬畏」與「神往」的神秘性，定期回到神聖的時間與空間，可以獲得性靈的重生。從非超自然的向度來看，透過神聖性的建構有助於社會

集體意識與道德價值的建立,強化社會的一致性病確保社群生存的延續。

其次,透過歷史回顧,探討古希臘時代的運動會精神,以及日治時代台灣公學校運動會的起源與發展,最後提出學校運動會的神聖性意涵與神聖性的建構。研究結果發現,古希臘的體育活動含有濃厚的宗教意識,使運動會帶有莊嚴神聖的氛圍。而台灣學校運動會起源於日治時代,當時為了達到殖民同化的目的,運動會成為灌輸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其神聖性的顯化是為了馴化人民,難以達到生命真正的自由與釋放。民主自由的教育思潮是當前教育主流,透過學校運動會的舉辦,結合儀式運用與環境設計,讓學生從分數的桎梏中超拔出來,創生另一種生命存在的意義,同時強化人我關係的凝聚,以及對學校的認同歸屬,就此而言運動會兼具德、智、體、群、美的陶冶,激化生命再生的活力與意義,其崇高而神聖的意義就在於此。

參考書目

一、中文

王鏡玲(2000)。神聖的顯現：重構艾良德宗教學方法論。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成窮、周邦憲(譯)(1995)。R. Otto 著。論神聖(The idea of the holy)。四川：人民。

宋清榮(1979)。體育倫理學基礎。體育學報，1，55-67。

林秀珍(2007)。學校運動會與教育神聖性的開顯。運動文化研究，1，29-52。

洪嘉文(2002)。各級學校運動會舉辦要點評析。學校體育雙月刊，12(1)，4-7。

許立宏(2005)。運動哲學教育。台北：冠學。

許佩賢(2005)。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

陳光金(譯)(2006)。E. Durkheim 著。道德教育(L'Education Morale) 載於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道德教育(頁3-20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葉憲清(1990)。學校運動會的經營管理。國民體育季刊，19(1)，22-35。

楊素娥(譯)(2000)。M. Eliade 著。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台北：桂冠。

劉一民(2005)。運動哲學新論。台北：師大書苑。

鄭志民(2001)。華人宗教的文化意識。台北：中華大道文化。

謝仕淵(2003)。日治時代台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台灣歷史學會會訊, 16, 18-30。

二、英文

Bernstein, H. L. & Peters, R. S. (1966). Ritual in educa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772(251), 429-436.

Caillois, R. (1959). *Man and the sacred*(M. Barash trans.). IL.: The Free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9)

Durkheim, E. (1973). *Moral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 K. Wilson & H. Schnurer, Trans.). NY: The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5)

Eliade, M. (1959).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W. R. Trask, Trans.). NY: Harcourt, Brace & Wor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

- Hoffman, S. J. (Ed.). (1992). *Sport and religion*.
Champaign, Ill. : Human Kinetics.
- Jackson, P. & Delehanty, H. (1995). *Sacred hoops: spiritual lessons of a hardwood warrior*. New York: Hyperion
- Korsgaard, O. (1990). Sport as a practice of religion: The record as ritual. In J. M. Carter & A. Kruger (Eds.), *Ritual and record: Sports records and quantification in pre-modern societies* (pp. 115-122). NY: Greenwood Press.
- Otto, R. (1923). *The idea of the holy* (J. W. Harvey, Tra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7)
- Peters, R. S. (1970/1966). *Ethics and educ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Wuthnow, R. (1992). *Rediscovering the sacred: Perspectives on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MI: Wm. B. Eerdmans.